

芦笛集

白俄羅斯人民詩人

楊卡·庫巴拉的生活與創造之路

——序朱筭譯的「蘆笛集」——

戈寶權

我不是詩人——不，上帝饒恕我。

這樣的光榮我一點也不尋找。

也許，我會編造出歌曲來，

人們只叫我——楊卡·庫巴拉。

在世上，光榮寵愛過詩人們，

給了他們多少的頌歌和桂冠……

我悄悄地唱着，——誰管這低低的聲音？——

楊卡·庫巴拉只在鄉村裏才被人知道。

若是沒有被歌曲溫暖的國家，

民族的命運便不知道詩人們。

白俄羅斯人同樣地沒有詩人。

雖然已讓楊卡·庫巴拉屬於他們。

——我不是詩人——

自從白俄羅斯的人民埋葬了他們的歌者和優秀的抒情詩人——楊卡·庫巴拉以來，已是整整的三年了，但是他所留給我們的珍貴的詩作，也正像誕

生了他的這個民族一樣，是永遠不朽的。這就使我回想起高爾基所寫的一篇短文，說意大利的人民爲了紀念他們的人民詩人喬望尼·帕斯科里，曾經在他的石像下銘刻了一排字：

「人是要死的，——但是人民是不朽的，而用自己的詩歌來震動了自己人民的心靈的詩人，也是永生不朽的。」。

我想把這句話拿來應用在楊卡·庫巴拉身上，那是再確當也沒有了。詩人應該向千百萬人說話，應該和自己的人民共生息和成爲自己的人民的代言人，並且也只有在這種地方，才存在着詩人的幸福和他最崇高的榮譽，遠在四十年前沙皇統治的黑暗的日子裏，楊卡·庫巴拉在他的第一首詩中，就叫出了這樣的聲音：

.....

讓我的力氣受苦吧——它了不得，——

兄弟們，我永世也不忘記，

俺也是個人，雖然是個莊稼漢！

只有那知道俺的生活的人，

他會明白俺痛苦的哼唉和叫喊。

讓每個人都來使喚我吧：

俺總要活着——因為俺是個莊稼漢！

——莊稼漢——

在這些詩句中，楊卡·庫巴拉表現出他和人民的血肉相聯，生息着人民

的喜悅和悲哀，爲人民叫出痛苦的呼聲。他在另一首詩中更有力地叫道：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高揚起我的詩句

在自己親愛的故鄉，

在白俄羅斯的田野。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是爲了那些生而爲貧農的人；

我和他們在一起，我們被

同樣的腳鐐所禁錮着……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是爲了那些無權的人、不幸的人。

我在森林裏、田野裏，

已經聽見了他們對我的詩歌的友愛的回聲。

但不是從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不是爲了你們（權譯）——

只從這首詩裏，我們就更知道楊卡·庫巴拉是怎樣的一個詩人了！白俄羅斯共和國的政府，當他創作二十週年紀念時（一九二五年）贈給他一個『人民詩人』的稱號，這決不是偶然的；只有這個稱號，才能更顯明地指出這位詩人的生活與創造的路程。

一 「在苦難中的行旅」

楊卡·庫巴拉正像他自己所說的：「俺是個莊稼漢」，是個出身自人民底層的詩人，而他的一生，也正是一條苦難的旅程。他一生的命運是悲苦的，其實這並不是他個人的命運，而是整個白俄羅斯人民的命運。在當時，白俄羅斯人民是生活在兩重壓迫之下：民族的和社會的。從前者講，他們是生活在沙皇暴吏和波蘭地主的鐵蹄與奴役之下；從後者講，他們是生活在無權無法的條件之下。他們時時刻刻遭受着殘酷的剝削與掠奪，因此饑餓、貧困、疾病就成了他們永遠的伴侶，而他們的言語更被禁止使用，視為是種「莊稼漢的語言」、「劣等的語言」；至於文化更不必說，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永遠是沉溺在文盲和迷信的狀態之中。這樣只有到了新的曙光，在全世

界六分之一的地而上升起時，他們才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解放，過着是自己的命運的主人的生活。楊卡·庫巴拉從年青的時候就目睹了一切，他體驗了社會的不平與民族壓迫的一切恐怖，他知道人類不幸的一切深度。

楊卡·庫巴拉 (Yanka Kupała) 的真名是伊凡·多明尼科維奇·盧策維奇 (Ivan Dominikovich Lutsevich)，於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新曆是七月七日），生在舊維萊伊斯克縣維亞桑卡大農場的一個佃農的家庭裏。他的父親是個沒有土地的佃農，爲了尋找工作 and 租田地，「命運就把他的父親從這一處地方投擲到另一處地方」，而他就跟着他的家庭，走遍了鮑里索夫斯克和明斯克縣，把他的童年和青春在各處的農場上和地主的領土上消磨掉，這正像他自己所說的：『我整個的少年時期，都是在他人的田地上，都是在經常依靠着地主和在地主壓迫的情形之下渡過去的』。他的父親也曾經一度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到明斯克去趕馬車，但是不幸的命運又把他擲回地主的莊

園，而在一九〇四年留下了妻子和兒女們死掉。

楊卡·庫巴拉受的教育也是非常可憐的，他最初學的是波蘭文，俄文是從他的奶娘那裏學來的。因為家庭貧窮和田地土需要人手的原故，他只能在鄉村的國民小學和明斯克的一所私立小學，讀過一個很短的時期。他雖然有一個機會可以進明斯克的實科學校，但是他的父親要留他在農場上工作，這樣只有到了十五六歲的時候，他才讀完了拜洛勒茲克的國民學校。至於進中學，在當時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夢罷了。楊卡·庫巴拉這樣回想起他的童年：

「我的父親曾有一個時期想送我進中學，但它只成了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窮困迫使我學了另一種學問，這就是在地主的田地上誦讀勞動的悲哀的書，和用木犁及鏟刀來寫出自己苦痛的悲哀的小說」。他在詩中也這樣寫道：

貧困斷絕了我走向學問的道路，

我沒有能達到書本中的至賢至聖，

白俄羅斯的語言和人民的歌謠

我是從母親那兒學到——既沒有書本也沒有學校。

從童年，從不愉快的年代起，

白俄羅斯原野的空曠成了我的先生，

田地上發芽和鄉村中的閒話，

就帶給了我各種學問。

——我的學問（權譯）——

爲了幫助家庭，他從小就在田地上做活，一直到一九〇一年。這之後，他在釀酒工廠裏做了三年的粗工雜役，『才知道從前所不知道的苦役』。他不久就又丟開了這個工作，到維爾諾的圖書館和當地的自由主義的報紙『

我們的田野』去做事。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這個時期中，他是住在彼得堡，讀完了契爾略耶夫的普通教育課程班，前後四年。繼而就又回到維爾諾去，參加了『我們的田野』報，直到一九一五年為止。這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楊卡·庫巴拉不得不撤退到莫斯科去。一九一六年他回到了明斯克，又到過波洛茲克和斯摩稜斯克等地，從一九一九年就定居在明斯克。

楊卡·庫巴拉的寫作生活，是從一九〇五年開始的。他的詩歌永遠是寫人民的生活疾苦並為人民歌唱。十月革命的來臨，帶給了他新生的力量，他自己也這樣寫道：『自由的創作活動，只有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後才開始。

……我的詩集出版了，我的詩歌在偉大的蘇聯的每個角落裏被歌唱着』。當一九二五年他文學創作二十週年紀念的時候，白俄羅斯共和國政府贈給他『人民詩人』的稱號。其實楊卡·庫巴拉不只是一位詩人、作家，同時還是一位社會活動家。他參加一切的社會活動，推進集體農場的制度，增進人民

的文化和物質生活的福祉。他是白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和烏克蘭國家科學院的會員，是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和明斯克城市蘇維埃的代表。爲了他的詩歌的功績，他曾經得過列寧勳章，一九四〇年時又以『從心中講出來的話』一本詩集，得到斯大林文藝獎金的頭等獎十萬盧布。

在這次蘇德戰爭爆發後，白俄羅斯的土地首先遭到德國法西斯的侵凌，楊卡·庫巴拉不但沒有放下他的筆，却用他激勵的詩歌，來動員白俄羅斯人民，來燃燒起白俄羅斯人民對於敵人的憎恨，要他們『以死還死，以血還血！』他還出席過斯拉夫人民大會，號召全斯拉夫夫人起來爲自由解放爲正義而鬥爭。

不幸的，是楊卡·庫巴拉沒有能看到勝利的來臨，沒有能看到白俄羅斯的光復解放，就於一九四二年的六月二十八日長逝了，享年六十歲。楊卡·庫巴拉的一生是光榮的，這正像悼念他的訃告中所說：『庫巴拉四十年來熱

烈地不斷地爲自己的祖國，爲自己的人民幸福而鬥爭。庫巴拉把他最大的才能，他整個熱血的心，他所有的力量，都獻給了祖國和人民」。也正像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書記高爾布諾夫在追悼會時所說的：「愛自由的白俄羅斯人民的偉大詩人和歌者逝世了，他的名字是全蘇聯的人民所敬愛的。他過去是並且將永遠是蘇維埃祖國的一個優秀之子。正像普式庚之於俄羅斯文學一樣，在白俄羅斯，楊卡·庫巴拉是白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奠基者。白俄羅斯現在正體驗着最可怕的日子。但是白俄羅斯人民重新得到自由的日子已經不遠了。那時候他們要重新歌唱着楊卡·庫巴拉的詩歌」。

楊卡·庫巴拉是在七月一日火葬的，在他的屍灰罐上寫着他的一行詩：

「我夢見了白俄羅斯」。

二 詩人的創造之路

楊卡·庫巴拉的文藝創作活動，是從一九〇五年開始的。在這一年五月十五日（舊曆）明斯克出版的白俄羅斯文報紙『西北角』上，登載了他的第一首詩『莊稼漢』，使他立刻獲得了他應有的聲譽。一九〇八年，他的第一本詩集『蘆笛集』出版了，這本詩集是以對於小農和貧農的窮困的描寫為中心的。這是一本精緻的詩集；封面上繪着一個吹蘆笛的村童，白俄羅斯文的『蘆笛』（*Niavalika*）一字，也是用許多枝蘆笛所組成的，這正象徵了這本詩集，用蘆笛吹出了農民的悲怨。但是不幸的，這本詩集出版之後不久就被沒收了，出版人還被傳到法庭上去。

『蘆笛集』可說是他創作第一個時期的代表作品。在這個時期當中，他

創作的典型，是窮困的、被虐待的和憎恨自己周圍的現實的貧農，也就是反抗地主、剝削者和警察的貧農的典型。這本詩集的寫作，也正是俄國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革命鬥爭的時期，但是楊卡·庫巴拉這時的詩，還沒有顯明地喊出革命鬥爭的號召來。他的詩多半是埋怨和同情農民的悲苦的命運，抗議對農民的壓迫和摧殘，抗議對地主的霸佔土地的專橫。但他這個時期主要的意向，是已傾向於要求白俄羅斯貧農的民族解放了。他在『蘆笛集』這個時期的政治理想，還並沒有十分展開，在他的創作中佔重要地位的『自由』，還是抽象的。

隨着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的失敗，和革命後反動時期的來臨，詩人的創作也經歷了一個低沈的時期，放棄了第一個時期創作中的具體形象，不能全心地相信美好的未來，這種內心的錯綜和矛盾，同樣也表現在他第二本詩集『古司里琴彈奏者』（一九一〇年）和一九〇八年所寫的一個詩劇

當中。這樣直到白俄羅斯民族革命運動高漲的年頭（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詩人才克服了過去悲觀和失望的情緒，但他的政治理想還越不出『我們的田野派』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更進而由於全國革命政治運動高漲的影響，楊卡·庫巴拉在他的詩歌中更加站在廣大人民『底層』的立場上，把自己的理想的實現，和他們的革命鬥爭相聯繫起來。這時候也正是楊卡·庫巴拉戲劇創作的最繁榮的時期，其中充滿了對於地主剝削者的抗議。在一九一三年所出版的詩集『拆散的巢』，就正表現了他這個時期創作的特點。這樣楊卡·庫巴拉就成爲白俄羅斯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彈奏者及人民的詩人了。

從這個時期起一直到十月革命爲止，還是詩人的摸索與探究的年代，因爲他還不能和『我的田野派』的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思想最後分手，一直到他看到了白俄羅斯農民的解放和白俄羅斯民族繁榮的保證，是有賴於蘇維埃